


变局中的世界与中美关系

CCIEE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课题总顾问：曾培炎

课题指导：毕井泉 宁吉喆 张晓强

课题组长：陈文玲

课题副组长：张焕波

执笔人：陈文玲 张焕波 宁留甫 谈俊
颜少君 孙珮 徐慧

目 录

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1
（一）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对立和动荡，和平发展的环境不断发生动摇.....	2
（二）全球经济面临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严峻挑战，疫后复苏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2
（三）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逆风和逆流，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亟待强化和完善.....	5
（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整或重塑的挑战，脱钩断链态势加剧.....	6
（五）全球性挑战愈发突出，人类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7
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	8
（一）美国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是严重误判.....	9
（二）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10
（三）美国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11
（四）中美两国远没有在全球治理中通过合作发挥前两大经济体的作用.....	11
（五）合作是中美两国最大的机遇.....	12
三、以经贸关系为重点开创中美关系互利共赢新局面.....	13
（一）共同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稳定大局.....	14
（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15
（三）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16
（四）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	16
（五）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17
（六）共同推动完善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	18

变局中的世界与中美关系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中美两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面对全球变局、乱局和危局，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进行合作，会产生巨大的正面溢出效应，能够形成应对全球挑战的合力。相反，中美如果不进行合作，甚至进行对抗，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不利于全球性挑战 and 问题的解决，甚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健康、稳定、可持续的正轨，可以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正向预期，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当今世界存在许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各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包括经济复苏乏力、通胀高企、债务负担沉重、气候变化挑战愈加突出、粮食和能源安全形势严峻、国际和地区战略性意外事件频发，战争风险陡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地缘政治形势日益对立和动荡，和平发展的环境不断发生动摇

国际和地区安全方面，传统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新的热点爆点不断出现。伊朗核、朝鲜半岛、叙利亚、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全球各类恐怖极端势力借乱生事、跨境勾连，不断利用新兴技术实施恐怖活动，恐怖主义的挑战依然突出。

乌克兰危机呈长期化、扩大化、复杂化态势，令当前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进一步承压，给世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来自乌克兰的难民人数从 2021 年底的 2.73 万人剧增至 2022 年底的 570 万人，导致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同时，乌克兰危机也推动全球出现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

巴以冲突再起，中东局势骤然紧张。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历来都是中东局势最脆弱的环节。1948 年以色列建国至今，先后发生了五次中东战争。自 10 月 7 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截至 11 月 1 日已造成超过 1 万人死亡，加沙地带超过 160 万人流离失所。如冲突继续升级，巴以危机将可能扩大和蔓延，导致整个中东地区以及更大范围地区陷入灾难，从而对全球能源市场、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处于历史高位，因意外或误判而引发冲突的风险居高不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2019 年 9 月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开幕演讲中所言：“一个新的风险正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还不算太大，但却是真实的。我担心大分裂的可能：世界分裂成两个，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制造出两个相互独立、彼此竞争的世界，每一个都有其各自主导性的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单独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它们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

（二）全球经济面临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严峻挑战，疫后复苏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贸易战和“去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全

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的报告，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远低于2000年至2019年间3.8%的平均水平（见图1）。世界银行预计，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即不引发通货膨胀的最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将在2023年至2030年间降至2.2%的平均年度水平，低于2010年至2019年间的平均值2.6%和2000年至2009年间的平均值3.5%，全球经济可能正在经历“失落的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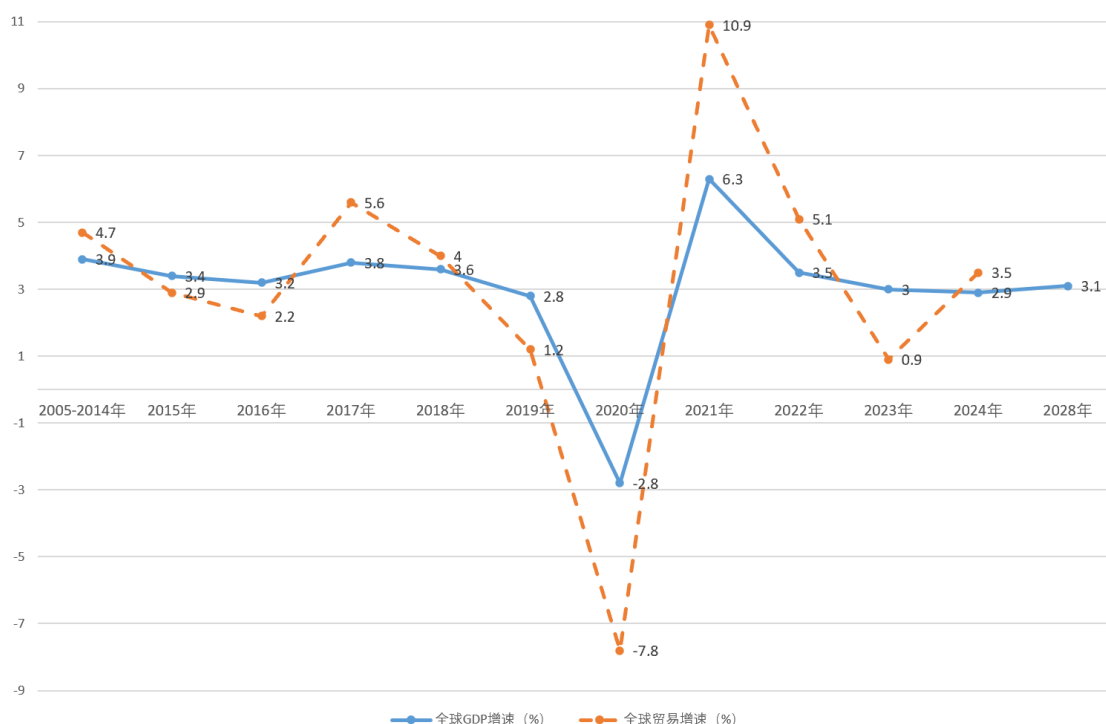


图1 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速情况

注：2023年、2024年、2028年为预测值

数据来源：IMF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分裂趋势加剧、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生产率增长过低等风险仍然令人担忧，部分国家进入深度老龄化。全球经济割裂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增长前景，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

通胀仍是全球多数国家面临的威胁。在全球93%的经济体中，通胀率仍居高不下，高于目标水平。尽管全球通胀率正在稳步下降，IMF预计将从2022年的8.7%降至2023年的6.9%和2024年的5.8%，但

要到 2025 年才能恢复到目标水平。美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已经从 6 月份 3% 的低点反弹，8 月和 9 月均维持在 3.7%，表明美国在降低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陷入停滞。从核心 CPI 来看，美国虽然与最高峰相比有所回落，但依然位于 4% 以上，处于 30 年来较高水平，经合组织（OECD）整体水平甚至仍接近 7%（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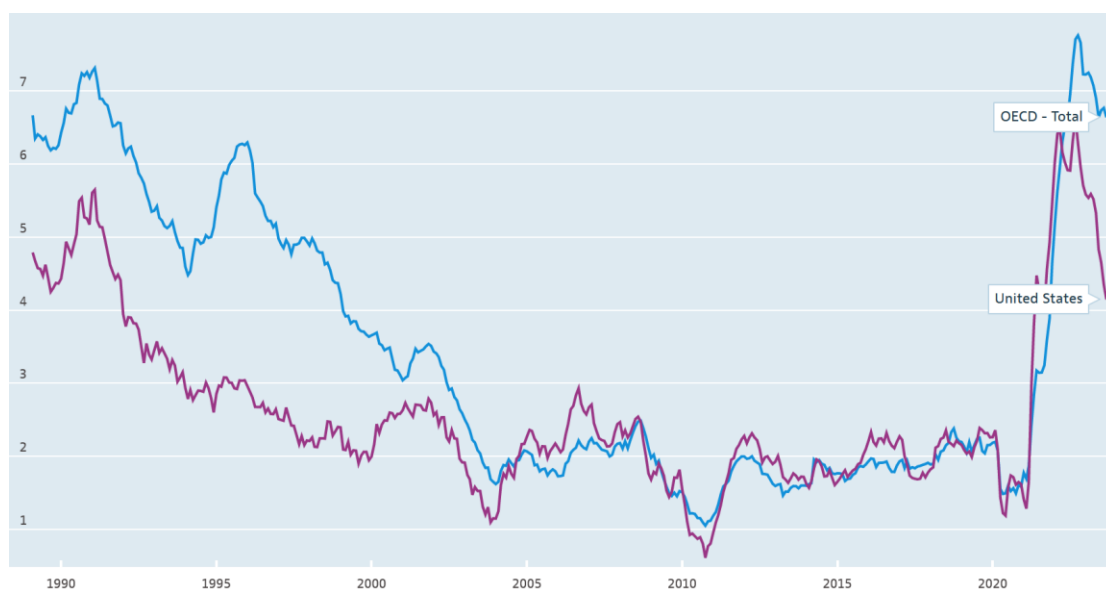


图 2 经合组织及美国的核心通胀率

数据来源：OECD

为控制通胀，多数国家被迫将利率维持在多年来罕见的高位，而高利率推高了贷款成本，抑制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给房地产市场、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带来压力。受美联储加息的影响，美国 30 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不断飙升，二十年来首次突破 7.5%，导致美国申请房贷的数量下降，房屋销售也大幅下滑。美国经济也受到高利率的明显抑制。IMF 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 2.1%，2024 年增长 1.5%；经合组织（OECD）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 2.2%，2024 年增长 1.3%。

不仅如此，全球债务在今年二季度增至创纪录的 307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比例达到 336%。美国国债已突破 33 万亿美元，按现行利率，预计仅支付利息将超 2 万亿美元。债务水平上升迫使国家、企业和家庭控制支出和投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生活水平。根据 IMF 数据，截至 2023 年 1 月末，70 个低收入国家中已有 9 个国家

陷入债务困境、28个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对于背负巨额债务的国家、企业和机构而言，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在较高水平，使它们面临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资本外流压力和债务困境加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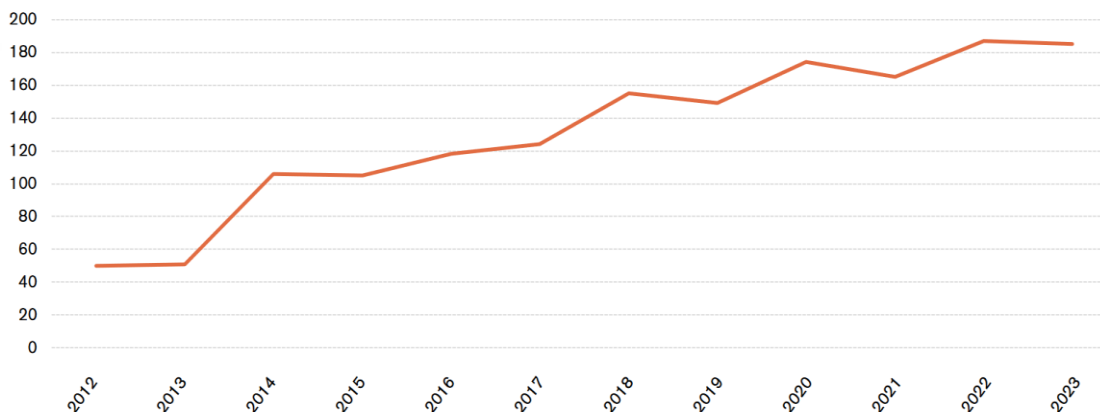
（三）经济全球化面临重大逆风和逆流，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亟待强化和完善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逆全球化的思潮日益抬头，美国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鼓噪供应链“去风险”，导致了贸易壁垒增多和贸易关系的碎片化，全球贸易投资显著放缓。全球贸易（包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速2022年为5.1%，IMF预计2023年降至0.9%。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2023年全球商品贸易量仅增长0.8%。同时，受乌克兰危机升级、食品和能源价格高涨及公共债务飙升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下降12%至1.3万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2023年国际商业和跨境投资的全球环境仍具挑战，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呈下降趋势。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改革进程缓慢。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上诉机构自2019年12月起即陷入停摆，各国政府的限制性贸易政策数量居高不下（见图3），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各国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缺乏沟通协调与合作，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地位的G20功能失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面临考验。全球主要货币发行国日益明显地将国际金融体系作为维护自身霸权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导致全球金融治理框架缺乏内在稳定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与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和获取资源的能力

严重不匹配，IMF 和世界银行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改革步履维艰，面临重重挑战。

图 3 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数量



数据来源：WTO

全球科技治理亟待强化和协同。以新一代移动互联、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深空深海深地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一方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新技术与数字经济等新形态造成的鸿沟加大，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刻挑战。新技术的治理规则尚处于空白状态，被政治工具化和武器化现象日趋严重，不同国家科技治理理念和体系的差异愈发难以弥和。

（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整或重塑的挑战，脱钩断链态势加剧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是市场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跨国企业供需适配自主选择的结果。二战后近 80 年里，全球形成了三大产业链供应链中心：以中、日、韩为主的亚洲，以德、法、英为主的欧洲和以美国为主的北美。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加剧了供给冲击的压力，特别是与国际市场嵌套程度高、联系度高的产业链、供应链产生了脱钩断链的风险。美西方国家利用疫情造成的供应链冲击和混乱，大肆泛化国家安全的边界和范畴，在强化自身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大打政治牌、安全牌和价值观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的态势日益加剧，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

美国联合盟友意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去中国化”。如在美国具有优势的半导体领域“去中国化”，成立包括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签署美、日、荷协议，对中国实施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和重要材料等出口管制和限制，利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企业在产业链高端对中国企业进行替代。2022年5月，美国在日本发起了“印太经济框架”，目前已发展到14个国家，试图利用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替代中国的中低端产业。

欧洲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向外转移。由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危机，欧洲的能源、电力、原材料价格上涨。高通胀和持续飙升的能源价格严重损害了欧洲制造的整体竞争力，企业外移的情况不断增加。美国3690亿美元的新能源技术补贴吸引了大批欧洲企业。据统计，在已经转移的欧洲国家企业中，三分之二的相关企业转移到美国，三分之一向中国等国家转移。

美欧大搞绿色补贴搅动全球供应链投资布局。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方案》，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以及劳动力发展提供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给予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补贴在3000亿美元以上。欧盟公布《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计划到2030年，每年10%以上的关键原材料开采、至少40%的关键原材料加工、15%的关键原材料回收都来自欧盟内部。确保任何战略原材料的消费量不超过65%来自单一的第三国。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入430亿欧元财政补贴，鼓励公共和私营企业对芯片制造商及其供应商的制造设施进行投资。这些措施将会带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甚至阶段性、间歇性、休克性的断裂。

（五）全球性挑战愈发突出，人类生存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愈加严峻。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1970年至2021年期间，发生了近1.2万起气候灾害，造成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达4.3万亿美元，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另有研究显示，从2000年到2019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野火、热浪、干

旱和其他极端事件每年造成超过 1000 亿美元的损失，每天达到 3.91 亿美元。世界气象组织宣布，2023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全世界极端天气事件多发的一年。综合有关国际机构评估，如果《巴黎协定》得不到落实，全球温升可能达到 3.5 摄氏度甚至更高。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 2030 年至 2050 年期间，每年至少会有 25 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

粮食危机迫在眉睫。2022 年，全球 24 亿人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约占世界人口的 29.6%，其中约有 9 亿人深陷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占世界人口的 11.3%。旷日持久的战争、极端天气、本国优先的出口政策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扩大，催生了爆发粮食危机的风险。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仅有 3 个国家对粮食实施出口限制，而目前限制粮食出口的国家数量已增至 19 个。自 2020 年新冠疫情扰乱全球供应链以来，小麦、玉米、大米和油籽等主要作物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而此前多年价格相对稳定。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存在诸多短板，全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远未形成，国际公共卫生资源匮乏，逆全球化使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更加脆弱。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以经济成本为由选择向海洋排放，等同于向全人类转嫁核污染风险，将引发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重大问题，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二、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机遇

中美建交以来，美对华战略一开始以合作为主，后来是合作加竞争，现在总体转向了竞争加遏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以“投资、结盟、竞争”为主题，将中国称为“国际秩序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一边声称不寻求与中国“新冷战”，不寻求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不阻止中国发展经济；另一边却始终没有停止对华进行遏制打压。在全球治理和一些地缘政治议题上，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符合其自身利益，因此也并未放弃与中国的合作。

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存在三种情景。第一种情景：中美关系的“乐观情景”，即中美两国能够走向以合作为主的竞争，作为全球第一、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合作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一系列

挑战将逐步解决或转变为新的机遇，世界经济可能迎来新的恢复增长长期，该情景目前短暂出现，但时间窗口有多长难以判断。第二种情景：中美关系的“基准情景”，即中美关系保持现有以竞争为主的合作，全球依然保持现有和平、安全和发展基调，不会出现直接军事冲突和对抗，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脱钩”“断链”与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依赖联系并存，这种情景有可能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第三种情景：中美关系的“悲观情景”，即中美两国发生军事冲突走向全面对抗，中美两国经济受到重创，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世界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人类和平发展主题发生根本改变，这将比一战、二战给全人类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该情景发生可能性不大，但概率在不断上升。

合作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最大机遇。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社会各界需要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充分认识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合作和挑战，变危机为机遇。

（一）美国把中国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是严重误判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在经贸、科技等一些领域存在竞争是正常的。但这种竞争应该是公平、良性的竞争，是有规则、有禁区的竞争，不应无视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当前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既有意图也有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把“竞争”视为了对华关系的全部，对华采取全方位的遏制打压政策，把中国当成假想敌，发起了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当前科技战已经成为主轴。这是美国在对华认知上出现了方向性问题，误用西方传统大国的发展逻辑来判断中国。近 20 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 总量占美国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0% 增长至 2021 年的 78%。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是中国自 2001 年加入 WTO 后，不断融入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规则体系。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美国接近，但在经济、军事、金融、文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实力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作为这一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感到压力甚至威胁，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中国在各方面可以全面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是抗衡美国的力量，因此把中国作为打击遏制的对象。这是重大历史误判。

（二）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近年来，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推动“脱钩断链”和“去风险化”，意图迟滞甚至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这些做法不仅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还伤及自身。美国推动“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寻求供应链“去中国化”，出台大规模排他性产业政策，通过高额补贴推动本土产业发展。这些做法违逆了全球产业分工大势，大幅增加了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致使美国对华出口中制造业产品占比不断下降，不仅重振制造业困难重重，还削弱了产业竞争力，拖累美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潜力。美在科技领域对华采取“小院高墙”战略，联合盟友对包括芯片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遏制和打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芯片销售规模约占全球的 1/3。中国市场长期是美国芯片企业在美国以外的最大市场（见图 4），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美国收紧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减少了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收入，危及其研发预算。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如果对华完全“脱钩”，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将失去 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 37%的收入，减少 1.5 万至 4 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尽管面对美国的打压围堵，中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仍然在快速提升，美国的“小院高墙”难以真正遏制住中国高科技行业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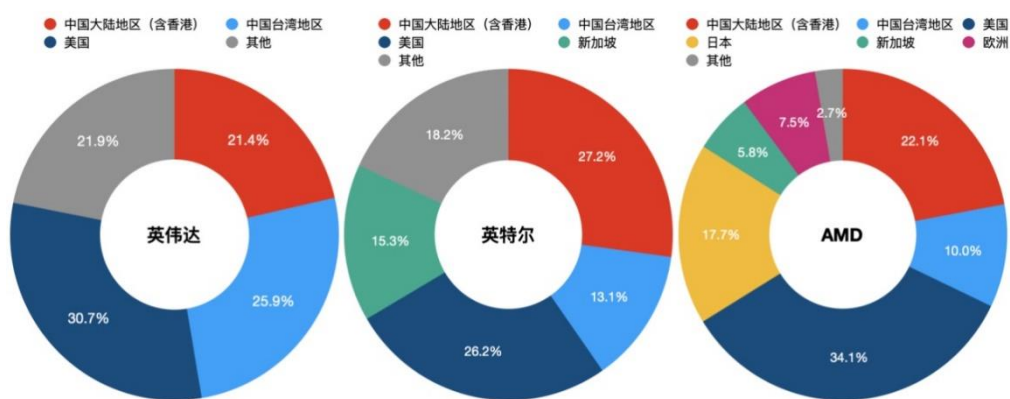


图 4 2022 年英伟达、英特尔和 AMD 的区域营收占比

数据来源：《财经》

(三) 美国把经济问题政治化

美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不断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固守冷战思维，建立价值观同盟，挑动意识形态对立，不断拉帮结派，胁迫他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仅干扰了全球市场正常运行，更加剧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混乱，引发国际规则竞争与冲突，对经济全球化造成巨大冲击。这些做法将解构甚至肢解几十年形成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使全球经济呈现碎片化态势，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根据 IMF 报告，如果全球经济陷入严重碎片化，总体经济产出可能萎缩 7%；如再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12%。作为世界大国，应顺应开放包容的时代大势，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做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和平发展有益的事，这样才能切实防范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带来的巨大风险，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基本尊重。

(四) 中美两国远没有在全球治理中通过合作发挥前两大经济体的作用

中美合作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双边关系中，还能为全球经济和全人类带来积极的变革。当今世界面临地缘冲突、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增长乏力、能源和粮食危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等多重挑战。加强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深度合作对于维护国际秩序、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不但会提升两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作用，也将增强两国之间和全球社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当前两国在全球治理合作上尚未形成合力，还缺少深度沟通和协同协调。美国虽然多次表达不寻求“新冷战”，但频频在国际热点问题上胁迫他国选边站队，实际是在推动世界向“新冷战”的方向发展，这将削弱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将世界拖入更大危机，美国自身也会受到反噬。全球的未来在于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促和平发展。在经济联系高度紧密的今天，“去中国化”对美国及其盟友乃至全球其他国家来说都具有高昂的成本和代价。

（五）合作是中美两国最大的机遇

在这个多变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中美合作是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和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途径。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合作不仅可以为双方带来重大的利益，也为全球的稳定、发展和繁荣提供重要的机遇。

2022 年中美经济总量占全球 GDP 比重为 43.29%（见表 1）、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双方利益交融十分紧密，两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加强中美两国经贸往来合作，既是两国互利共赢的需要，也有助于稳定全球经济。中美经贸关系是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形成的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互利共赢让中美经贸合作拥有强大的内生动力。近两年中美贸易额屡创新高，2021 年中美贸易额突破 7500 亿美元，2022 年达到近 7600 亿美元，远高于 2017 年的 5837 亿美元（见图 5）。中国是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离不开中国。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已有 313.8 万个 5G 基站，2024 年将实现 5G 网络的全覆盖，北斗卫星系统精准度可媲美美国的 GPS 系统。在超算方面，中国正在构建国家超算网络系统和数字底座，开展“东数西算”工程，大数据一体化加速推进。依托于数字化基础设施形成的新优势，中国会出现更多全新消费场景，形成超大的市场规模。

表 1 不同时期中美 GDP 之和占全球 GDP 比重

	1982 年	1992 年	2002 年	2012 年	2022 年
美国 GDP（十亿美元）	3343.8	6520.3	10929.1	16253.9	25462.7
中国 GDP（十亿美元）	284.6	492.1	1465.8	8539.6	17886.3
全球 GDP（十亿美元）	11310.3	25351.6	34969.2	75277.9	100133.4
中美 GDP 之和占全球 （%）	32.1	27.7	35.5	32.9	43.3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为现价美元数，中美 GDP 之和占全球比重为计算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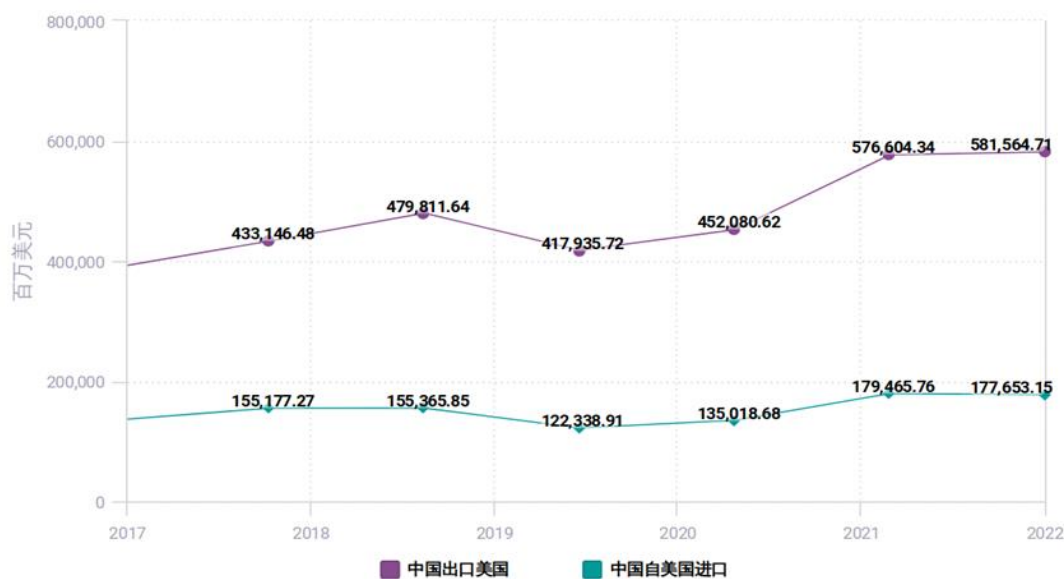


图 5 2017-2022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CEIC 数据库

中美通过共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可以为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美都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加速全球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技术支持。面对气候变化、疫情防控、国际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可以集中资源和智慧，共同寻找有效解决方案，为全球的稳定和安全做出贡献。在当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美合作有助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为构建更为公正、公平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提供支持。

三、以经贸关系为重点开创中美关系互利共赢新局面

中美在经贸领域、安全、科技、人文等诸多领域均存在广阔合作空间。面对当前愈加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双边关系挑战，两国应从人类共同命运出发，摒弃冷战思维，跳出丛林法则，展现大国的历史责任与担当，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继续稳固并深化中美经贸合作，充分释放双方在安全等非经贸领域合作潜力，不断开创中美互利共赢新局面。

（一）共同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稳定大局

和平是发展的基石。没有和平的环境，发展也无法实现，发展成果也会得而复失。“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格局保持总体稳定，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经济规模不断攀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全球GDP总量为1.39万亿美元，2021年提高至96.1万亿美元（见图6），2022年进一步增加至101万亿美元。多个国家通过较长时期的平稳发展摆脱了贫困状态，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部分国家成功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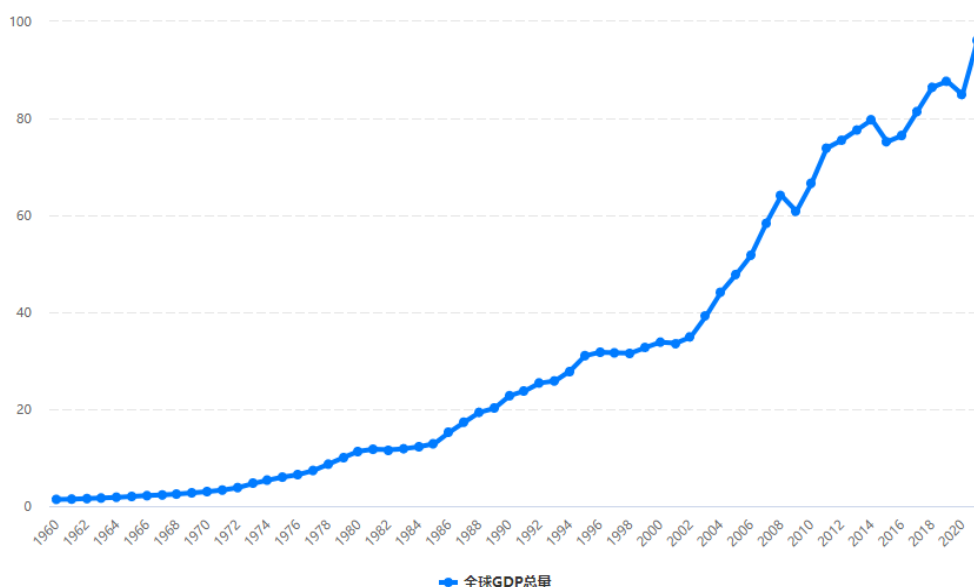


图6 1960年—2021年全球GDP总量（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GDP数据为现价美元

中美携手维护世界和平大局，政策外溢效应广泛，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大局中可以而且应当发挥更大作用，这不仅使两国受益，也造福世界。双方应加强合作，从全球可持续发展大局出发、从冲突地区实际出发、从人民福祉利益出发，切实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蔓延，使冲突地区的“温度”降下来，推动世界局势朝着和平的方向不断迈进。

双方应携手推动国际社会以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分歧。积极发挥中美等大国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各方回到谈判桌前，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分歧，找到符合双方利益

和安全的解决方案。坚决反对诉诸武力，将冲突控制在特定范围内，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化。切实保障冲突地区民众生命安全。加大对冲突地区民众的人道主义援助，避免冲突地区爆发饥荒、大规模传染病。应推动各国加强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强化国际组织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推进各国遵循正义、公平和平等原则，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

（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贸易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长足发展，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显著提高，并形成了一系列由各国共同遵守的规则制度体系，有效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平稳发展。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但从长远来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的快速进步与广泛应用，蕴含着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因素，经济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由之举，也是当前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和平稳发展的“稳定之锚”。

中美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动力。两国应加强经贸合作，促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要维护并完善基于规则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进 WTO 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使 WTO 上诉机构尽快恢复应有职能。要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历史潮流，推动各国扩大市场开放，降低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市场准入门槛，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推动各国合作开展数字和绿色发展领域的投资，减少各国非关税壁垒和隐性歧视政策数量。避免将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纳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妥善处理贸易投资摩擦和争端解决。

要加强中美贸易沟通，建立并保持政府间沟通渠道，用好中美刚成立的三个经贸工作组，加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沟通，积极推动美方削减和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不合理关税，使消费者和企业尽早受益，维护双边贸易互利共赢；通过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沟通的平台。加强沟通，增强双方基于国

家安全管理的政策透明度，保护好中美已经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贸格局。

（三）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是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基础，能够切实保障各类要素、资源、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配置。高效、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对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美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力量。中美分别是亚洲供应链、北美供应链的核心国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具有广泛影响。美国强大的研发设计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发挥有力牵引作用，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重要枢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提供有力支撑。

中美应携手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中美两国应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合作，不断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切实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保障全球航空、铁路、公路、海运等立体交通运输网络畅通；持续推进全球三大产业链供应链中心融合发展，提升区域间互联互通水平；推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数字赋能，以科技进步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韧性。我国要加大深化改革开放的力度，切实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积极稳住和扩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将进一步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管控、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增强全球供应链弹性和稳定性。

（四）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性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液”，金融稳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挥着“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历史多次证明，金融体系不稳定往往会引发经济超出合理范围的波动，甚至会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经

济的发展进步也需要金融体系不断的发展、创新，满足日益多元化金融需求。不能因为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而放缓甚至停滞金融发展步伐，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的总体平衡。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复杂，金融动荡风险加大，中美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合作，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加强对重点金融领域的风险分析与研判。加强对高利率环境下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的跟踪与研判，推动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基于新形势开展压力测试，防范再次出现类似硅谷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的破产倒闭风险。加强对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形势演变的跟踪与研判，提前做好应对工作。进一步优化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推动各国加强加密货币领域监管协调，促进加密货币有序发展。密切跟踪加密货币价格波动水平较大给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全力追踪加密货币交易痕迹，坚决打击借助加密货币渠道的洗钱等违法行为。加强中美金融领域政策沟通协调，就金融市场准入、跨境资本流动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共同推动加快落实《G20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提升两国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推动上海与纽约证券市场互联互通；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合作，共同推动开展多双边国际金融合作，健全国际金融规则，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利益，完善全球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体系，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脉，生态是人类所赖以存在的基石，这三方面都是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系。中美同为全球能源、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曾开展合作并取得了积极进展，未来双方需要继续加强合作，共同促进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中美应携手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保障全球能源供应链畅通；增强能源供给，保持全球能源供求总体平衡和价格总体稳定；推动全球新能源领域合作，促进全球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化、绿色化转型；提高全球能源储备水平，增强应对全球能源领域突发事件冲击能力。

要发挥中美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各自优势，深挖双方合作潜力，提升农产品生产效率。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减少全球粮食供应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积极推动国际粮食合作，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投资，降低关税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深入推进农业科技国际合作，以科技创新增强应对粮食风险能力。在 G20 等国际合作论坛上就粮食安全发出共同声音，共同反对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和粮食保护主义政策；在 WTO 推动粮食贸易便利化措施，共同维护粮食运输通道安全。

中美要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大力推动节能减排降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携手国际社会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环境治理，切实增强生态风险和生态灾害应对能力。应共同推进生产生活的绿色化转型。携手推进国际社会在低碳能源产业领域的技术合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推动中美气候对话工作组加强磋商，落实《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和《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就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能源安全和电力短缺等问题尽快达成共识；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联合国多边治理框架，合作推进全球气候多边进程，两国可在 COP28 推进《巴黎协定》准确、全面、有效落实，大力扩展中美两大清洁能源市场联通和净零技术合作，达成中美清洁供应链合作共识，共同维护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六）共同推动完善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

当前，全球形势变乱交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科技等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极大冲击了原有的全球利益格局，成为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新版图的重要力量。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南方”国家影响力不断提升，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人民的不安，全球的安全、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原先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难以适应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要。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加强和完善与时代进步相适应的、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中美要共同推动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制度体系。携手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改革，推动 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的投票权、管理权等改革，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巩固 G20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动其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美要加强在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方面的协作。要携手推进完善全球数字治理，加强各国在数字经济规则领域的磋商，提升各国数字经济规则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形成反映各方利益关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搭建数字合作平台，深化数字化服务、数字技术的国际间交流合作。加强中美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放宽数字经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数字领域投资规模。推动绿色发展领域规则的互联互通，加强各国在绿色债券认证、绿色基金标准、绿色企业主体评估认证等方面标准的对接。应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合作，支持在充分尊重各国政策和实践基础上，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讨论成立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机构；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